

简帛《五行》篇的文章主旨再思考

王艳芬¹

摘要

出土文献《五行》篇有帛书和竹简两个版本，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思孟学派作品且主要讲述了仁、义、礼、知（智）、圣的关系情况。然而，本文认为帛书本和竹简本重合的文字部分为《五行》的经文，经文部分表意完整并且足以表达《五行》的主旨。《五行》的主旨为，论说如何“闻（君子）道”，如何从仁、义、礼达至圣、智，进而可以“闻道”，“闻道”就会“有德”且产生愉悦之情，同时知贤、尊贤、举贤也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关键词：五行；君子道；闻道；经解体；经说体

I. 《五行》的出土和命名

出土文献《五行》篇，有帛书和竹简两个版本，内容不完全相同。先说帛书本，它一九七三年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抄写于《老子》甲本后面。竹简本《五行》，一九九三年出土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区四方乡郭店村的战国楚墓中，专家推测入葬时间是战国中晚期，约公元前三百年左右。其文字，与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五行》篇的经部的内容大体上是相同的，但是没有“说文²”的内容。同时，在大体相同的经文部分上，个别的文辞字句的用字、多寡有所不同，段落先后次序也有一些差别。再说篇题命名，由于简本正文中以“五行”开头，推测这是对紧随其后下文的概括，由此而得名。³

关于篇题“五行”的得名，还需要再说明一下。《荀子·非十二子》中有：“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这里批评了“五行”说，且指出其倡导宣扬者是子思和孟子。那么再看，《孟子·尽心下》有：“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

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这里刚好提到了仁、义、礼、智和圣人，和出土发现的这篇文章开头部分提到的仁、义、礼、知（智）、圣⁴，十分相似。那么，一些专家学者就以为这篇出土文献，就是《荀子》所批判的思孟学派作品“《五行》”，如庞朴认为“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之一（即《五行》），是‘孟氏之儒’或‘乐正氏之儒’的作品”，即呈现“思孟五行说”的文本。⁵这大概也是原始的文献整理专家们⁶，把本文命名为“五行”的原因之一。⁷正如池田知久提到的：“至今约二十年的《五行》研究的最大特征，就是认为在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整体中存在着一种占有重要位置的思想——‘思孟五行说’，而作为其具体体现的就是这次新出土的《五行》，并从这个角度出发来分析包括成书年代和作者的所属学派等在内的诸问题。”⁸且池田知久认为对于《五行》的研究，不应囿于“思孟五行说”，而应从更为广泛的视野上把握探讨之。⁹当时也有不同意见，如魏启鹏曾将其命名为“德行”¹⁰，如此对于《五行》篇中由仁、义、礼、智、圣组成的“五行”概念的探讨就不像前面学者那样用力，因而对于文章主旨的把控也略有不同。

综合来看，结合了《五行》文本的特点以及历史的记载，而确定“《五行》”作为此篇文献的篇题，还是比较合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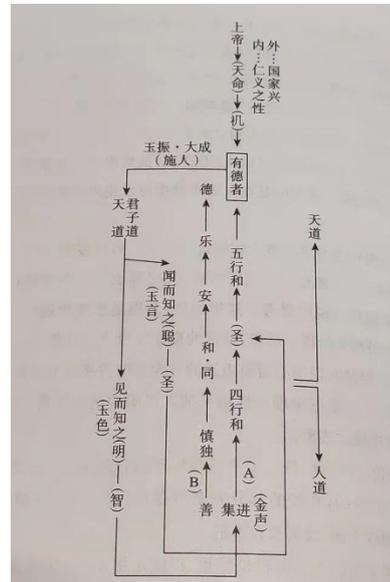
II. 目前对《五行》篇的文章结构与主旨的判定

关于简帛《五行》篇文章的结构和主旨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迄今为止，庞朴¹¹、浅野裕一¹²等人都做过较为详细的原文释读，下面就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受到学界普遍认可的一些说法进行介绍、评述。

首先，来看庞朴的观点。庞朴认为，帛书《五行》分“经”“说”二部，一共有二十八章。《帛书》五行的主要内容为，其第一章总论德与善，认为德是形于内的仁义礼智圣，意指形而上的天道为人心所体认（道德信念）及其显现于人性（道德属性）；谓善为不形于内的仁义礼智，意指形而上的天道为人所施行（道德实践）。德可径称天道，善则为人道。第二至第九章，论如何成德，即如何树立道德信念，提出了“思”即实践理性诸范畴。第十至十七章，论如何能为善，实即道德实践的动力和步骤，提出了“气”范畴和为善的阶梯。第十八至二十一章，论德（五行）与善（四行）内部诸因素的对立统一关系。第二十二至二十六章，论心身关系，特别是心的能知能虑作用。最后两章，总结。¹³庞朴认为，帛书着重论证了如何始能得道成德、以及如何始能为善的步骤，等等。此外，《五行篇》还论述了仁义礼智圣五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¹⁴庞朴的观点较有影响力，后来许多学者都借鉴了其成果，这体现在研究的底本选择、研究方向和思路选取等方面。另一个需要说明的是，起初，不同的研究者对于刚出土的《五行》篇，有着不同的题目命名、分章和内容校释，在研究中我们需要加以分辨。

浅野裕一在参考了庞朴等人的研究成果后阐明了自己观点。依照时间来看，他的研究日

文版发表较早，而中译本最近才翻译出来，因此先列举他的观点。浅野裕一以图示的形式表现《五行》的思想状貌，并进行了说明¹⁵：



浅野裕一：《五行》的整体思想性体系（《黄老道的形成与发展》，凤凰出版社，2021年，第548页）

如图所示，浅野裕一梳理出了《五行》的思想逻辑线索的同时，也指出《五行》中含有逻辑混乱和模糊不清的地方，一些研究者或许表示认同，笔者也略有此感。简言之，浅野裕一认为，《五行》设置了两条路线：一是依次履行五行即仁、义、礼、智、圣，扩充伦理，上升到“五行之所和”的德、天道阶段；一是从修得的道德名目中抽象出一些有用的要素，将其收敛于自身的内部中，成为“有德者”“有天德者”¹⁶。这两者表里一体，与兴起新王朝相关，这相当于“（集）大成”或“玉振”的阶段。另外，文中还提到了贤人、君子的作用，他们用言行引导人们走上“君子道”，传达上边的两种“天道”。但是就贤人、君子施教的对象而言，施教对象的领悟力还是有差别的，有的是“闻而知之”，有的是“见而知之”，这导致他们的进阶路线、过程是有差别的。以

上,就是浅野裕一对于文章逻辑、内容的认识。可以说,与刘信芳的观点相比,浅野没有断言说这是一篇有关认识论的文章,在浅野的描述下,《五行》更像是同《大学》一样的,介绍怎么修养德行、德行进阶的指南,德行和修养、理论和实践并重。同时,《五行》行文有逻辑的一体性,但也略呈现出冗沓不清的状况。这一点,大概研究者都多少意识到了,所以完全地给《五行》做个篇章逻辑的解说,还是存在一些难度的。最后,浅野裕一经过对比《孟子》《大学》《中庸》,认定《五行》是子思、孟子系统的文献¹⁷。

刘信芳也曾发表过关于《五行》篇章大意的见解。刘信芳将简帛《五行》隶定为三十三章,概括之,认为“一到六章论行,七至十一章论思,十二至十三章论群体意识和个体意识,十四至十五章以金声玉振之概括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十六至二十章是对仁义礼知圣显于外的具体说明,二十一至二十二章论必然之礼与自由之乐,二十三至二十九章论述对仁义礼的具体要求,集大成或者成是检验仁义礼的标准,三十至三十一章论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三十二章至三十三章论认识之本质”¹⁸就是说,他认为《五行》是讲述了有关认识论的内容,仁义礼与集大成这些有关认识、主体与客体、认识与实践、认识的阶段性等等内容。可见,刘信芳的说法是深受庞朴影响的。

虽然从刘信芳的总结中依然不能看出篇章之间联系的紧密性和章节间的贯连性,但至少为文章的主旨定了基调。同时,他也认为这篇文章有可能是儒家作品,且认为子思对其进行过加工梳理¹⁹。

再来看一下涂宗流、刘祖信的观点²⁰。二人在《郭店楚简先秦儒家佚书校释》的《〈五行〉通释》中,参照帛书本,将简本定为二十七章,又按论述的内容把文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总说仁、义、礼、智、圣,以及“五行”“四行”与德、善之关系。第二部分,以何谓君子为契机,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仁、智、

圣。第三部分,以有德为中心,从正、反两方面论述圣、智、仁、义、礼,以及“五行和”“四行和”。第四部分,以君子闻道与行道为中心,论述仁、义、礼以及善、德。²¹一些学者认为《五行》篇主要的侧重点是论述仁、义、礼、智、圣这“五行”的概念和关系等问题,而涂宗流、刘祖信认为文章虽然简本以“五行”开头,“但落脚点是言君子所为,根本问题是君子为善为德”²²,第二部分虽然从正反两方面论述过仁、智、圣等,但落脚点在君子所为,第三部分讲君子为善、为德的问题,虽然提到圣、智、仁、义、礼,也是为了强化对君子的道德要求,强调君子要为善、为德,第四部分也提到了仁、义、礼、智、圣,但指出这五者合一为“和”,“和”即是“德”,最终以“闻道而乐者,好德者也”结尾,讲的还是君子要为善、为德的问题。²³

与前面的研究者观点相比,涂宗流、刘祖信的观点比较鲜明,而本文的研究也与之有类似的发现。

然后,可以参考一下葛荣晋的观点,他也承认《五行》篇的第一段扼要阐述了“五行”的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思想架构,即“德之行”与“行”,并指出这段文字最重要。《五行》篇将“心”分为内心与外心,由内心外心的不同作用开出不同的德行。在经过一些步骤,能够达到“几而知之,天也”的人心与天命合一状态,即天人合一的圣智境界才是《五行》所追求的。²⁴与一些观点相比,葛荣晋的阐释是层层递进的,层次梳理的也比较分明、紧密,指出了《五行》篇作者的最终追求即“圣智”,《五行》是有起始有目标指向的,全文的文字组织是为一个终极目标服务的。虽说他认为提及“五行”概念和“形于”内外的第一段最重要,但这是“提出概念”上、展开论述上的重要性,而不是写作目的、逻辑最终指向上的“重要”,这需要注意。类似地,任蜜林采纳了涂宗流、刘祖信“君子道”思路,对此观点进行了补充阐释²⁵。

纵观现有的研究，庞朴的观点影响力大而广泛，受到学者们的普遍认同，如他们认为《五行》是有关心的认知功能、关于道德信念和道德实践的文本²⁶，且《五行》的篇章结构完整。但是，这样的阐述也言有未尽，一旦确立了“五行”作为此篇文献的标题后，学者们就自然而然地拘泥于“五行”形于内外问题的讨论，从而忽视了文章主旨的其他可能性。《五行》的核心要义²⁷仍有讨论的空间。

对《五行》的结构和主旨进行重新的梳理后，可以发现，如果抛开将本篇出土文献命名为“五行”以及归类于思孟学派的观点影响，重新审视已有的简、帛两个版本，就可以发现解读简帛《五行》篇主旨的新线索。

III. 《五行》篇属于“经解体”

前文提过，《五行》的帛书本和竹简本存在一些差异，比如帛书本含有“经”与“说”两部分，而竹简本只有“经”的部分。同时，“未尝闻君子道，谓之不聪。未尝见贤人，谓之不明……四行之所和也。和则同，同则善”一段文字，在竹简本与帛书本经文中的顺序不同，而且有的学者认为其中一些内容是先秦“经说体”文章中“说”文的窜入，然而这有待考察，不能下定论。

针对这个问题，有必要介绍一下先秦解经文体的情况，即经说体、经解体的相关内容。

先秦时期的文体，可以先从“经”说起。“经”原本指纺织时的经线。有学者指出，在先秦，作为文字作品上所谓的“经”，是借用织物经线的原意，来表示有原始典籍和纲要性质特征的文章的。“作为文史典籍的‘经’，一是指言说的纲要（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发言提纲），二是相对于具有传注的原创性典籍而言。”²⁸接着，“说、解、传，都是源于对原典、即‘经’进行解释这一性质的行为。”²⁹泛泛而言，“经”是具有权威性的、内容文字相对固定的文本，而文本的权威性至少有两个来源，

一是政治权威，即官方认证，一是知识权威，即知识学问界或某学派内部公认的规范性文本等。³⁰

那么所谓的经说体、经解体具有什么特点呢，简单来说“说”与“解”都属于对于“经”的解说性文字，高新华曾指出先秦诸子中的这种解经文体在目前阶段仅有经说体和经解体两种。经说体的“经”与“说”大概是同一作者在同一时期所作的作品，“说”是为了让经文浅显易懂，在诸子时期较为常见³¹，而经解体有可能是老师的授课讲义或是记录，作者大概不是同一个人，甚至创作于不同的时期。³²

比较有代表性的，庞朴最早提出了帛书《五行》篇含有“经”和“说”内容，其中“经”提出了若干命题和基本原理，“说”对这些命题和原理进行了解说，两部分互相校补后，《五行》就基本可以读通。³³池田知久进一步指出，在《五行》的同一章中，经文和说文，在思想内容、措辞表现上都是紧密结合而不可分割的，不存在思想上、表现上的矛盾。³⁴诚然，大多数权威学者如庞朴、池田知久等，将帛书本《五行》经文之后的解释性文字称为“说”，在事实上，“说”比较忠实于前面的“经”文，很少有超越经文的引申发挥、多是“思不出其位”的。

郭店楚简本《五行》出土后，帛书与竹简本可以互相对照补充，再结合高新华的研究，如果抛开被称之为“说”的部分，单来看“经”文的部分，会发现它自身就是结构完整、表意相对清晰的，即使没有“说”的存在，“经”也可以表述清晰文章要旨。就如，大体上有“经”无“说”的竹简本《五行》，即使没有“说”的辅助，大概的意思也是明了的。也就是说，《五行》的“经”文，并非是言简意赅到了必须依靠“说”文补充阐释才能被理解的。同时，结合郭店战国楚简本和马王堆汉墓帛书本《五行》的出土情况，也可以大略推断出，目前公认的《五行》“经”与“说”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形成于一时之间，“说”应该是晚出的，

被学者们普遍称为《五行》的“经”文部分在思想和结构上是可以独立成篇的。³⁵

综上，按照高新华列出的标准，可以判定《五行》篇并非“经说体”，而是“经解体”。³⁶《五行》的经文，或说被认为基本上有“经”无“说”的简本《五行》是一篇独立成篇的、思想较为完整的作品。那么对于《五行》的文章结构、行文逻辑和主旨的推断，仅从经文上或从简本上考察，就能比较完整地展现其面貌。

在如今已出版的众多专业释文中，李零著作的《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³⁷对竹简原文整理比较清晰简明，因此下面选取此版本进行分析与说明。

IV.再议《五行》篇的行文逻辑与主旨

李零本将《五行》全篇分为28章（下面用阿拉伯数字注明章节）³⁸。

试想，如果抛开《五行》篇的主旨是讨论仁义礼知（智）圣的既有观点，而是注意从“道”“君子道”“闻道”的角度考量，可以发现不少佐证。《五行》篇中，“道”出现在第2、3、7、11、15、17、20、22、24、28章处，在第3、7、15、17、24章处都出现了“君子道”，第28章述说了“闻道”的问题。如此可以发现，“君子道”或相关联的“闻道”概念出现的频次是有规律的，《五行》作者每论说一段内容就会申述一次“君子道”或“闻道”的问题。

根据以上线索来看，可以设想，《五行》篇的作者也许论述的重点并非在仁义礼知（智）圣的内涵外延、“形于”内外及相互关系问题上，或说这并不是文章写作的主要目的，其更强调的是君子道是什么、怎样闻道的“闻君子道”问题。

按照这个思路，接续看文章最后一句为“闻道而悦者，好仁者也。闻道而畏者，好义者也。闻道而恭者，好礼者也。闻道而乐者，好德者也”。闻道有四个方面，即好仁、好义、好礼、好德，最后一点“闻道而乐”是“好德”，可

以看作是“闻道”的最高境界。若假设这句是《五行》篇的主旨句，那么可以返回前文，整体地对照验证一下。

《五行》的内容展开包含了两条线索，即五行和“三道”，乐道而有德。兹列出简本《五行》的关键词及其对应的段落如下：

- a.仁、义、礼、知（智）、圣（“五行”）关系：1-7、12-14、18-26章，圣智仁（义礼）；
- b.人道—君子道—天道（“三道”），是境界不断升级的三个阶段；
- c.“三道”与德：1-3、15-18、28章；
- d.五行与“闻三道”的关系：4-11、15-18章圣智与闻道，8-10、22、25-26章君子道，27章天道、人道，28章闻道；
- e.（五行）和-闻道-乐-有德：“乐道”而“好德”也是贯穿文章的一条线索，1-11、28章乐君子道、闻道有德。

1.仁、义、礼、知（智）、圣的（“五行”）关系

第1章，讲了仁、义、礼、知、圣五个概念，可以看成总说“五德”（即“五行”）。第2章，讲了德、善与天道、人道，以及乐与德的关系，“乐则有德”。第3章，提到君子、“士有志于君子道谓之志士”，和德-志-智-思-形-安-乐-德的推衍关系。这第2、3两章可以看成是讲“乐于君子道就是有德”的观点。即第1、2、3章，讲述了乐君子道即有德。

第4、5章讲“仁”的问题，接着第6-11章讲到“玉色”“玉音”与闻君子道、圣直接关联，在第11章再次重申善、德的人道、天道与圣-智-仁-安-乐-德之间的推衍关系，强调“乐”才能“有德”，这个最直接的前提就是有“仁”。至此，照应了《五行》篇最后一章的第一句“闻道而悦者，好仁者也”。“闻道”与仁的关系阐释明白了。即第4-11、28章讲乐与仁、闻道有德，第1-11、28章讲乐君子道、闻道有德。

第4、5章，比对了“不仁之思”和“仁之思”的特征，再与第6、7章的知和圣相互联系

起来，引出第 8、9、10 章君子慎独、为善为德的问题，第 11 章又从反面重新申明圣、智、仁的关系。这里“不仁”与“仁”反向申说的手法，与第 15、16、17、18 从反与正两方面说明“未尝闻君子道”和“闻君子道”的手法如出一辙。即第 8-10 章讲君子慎独、为善为德-君子道，第 15-18 章讲述闻君子道。

值得注意的，第 4、5、6、7 章为什么只比对了仁与圣智的关系，而没再提及义、礼呢？答案在第 18 章，即“仁，义礼所由生也，四行之所和也”，仁可以生出礼、义，那么仁应内含义礼的成分，单独言仁能统摄义礼，如此，才会在此只出现仁、圣、智的讨论，而不提义、礼，而文中其他地方也没有再见到单独论及义或礼与圣、知的关系。即第 4-7、18 章讨论了圣知（智）仁（含礼义）。

然后，第 12、13、14 章分别说了仁、义、礼三方面，对应《五行》篇最后一章仁、义、礼的层次结构。即第 12-13、28 章，讲仁义礼。

第 15、16、17 章，从正反两方面分别说了“未尝闻君子道”“闻君子道”的与圣、智的关系。听得见、听得精妙叫“聪”，看得见、看得精审叫“明”，挂靠到对象为“君子道”上时，能“闻”君子道就称为“圣”，能明察“贤人”、君子的就称为“智”，所以圣、智是平级的概念。

再来看第 18 章，“仁，义礼所由生也，四行之所和也。和则同，同则善”，“圣，知礼乐之所由生也，五（行之所和）也。和则乐，乐则有德，有德则邦家兴”。

这有两层意思，首先，仁生出义礼，“四行所和”“和”到了“仁”上，“圣”能知道“礼乐之所由生”，礼来自仁，乐来自“和”，“仁”又是“四行”之所和，那么乐也来自仁，那么“圣”就是能知仁了，而“和则同，同则善”，仁又与“善”联系起来，那“圣”就能知仁、善了。即第 15-18 章讲闻君子道与圣智。

至此，仁和义、礼的关系清楚了，圣和知、仁的关系清晰了，即仁义礼以“仁”为中心是

一个层次，圣知（智）是高于仁义礼的另一个层次，而圣比知（智）层次更高一点，是认知的最高层级，与道密切相关。

2.如何达至“闻道而乐、而有德”的“君子道”

人道—君子道—天道，是境界不断升级的三个阶段。

第 17 章论说“闻君子道”的同时再次申说了“和则乐，乐则有德”的问题，“和”就是第 2 章开头提到的“四行（仁义礼智）和谓之善”，而“善，人道也”，那么“和则乐”也就是“善则乐”，再根据第 3 章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就能表达出“有人道则乐，乐则有天道”的意思了。再，根据第 17 章的“闻君子道，聪也。闻而知之，圣也。圣人知天道也”，就有“乐天道”即是“乐君子道”，同时根据第 15 章“未尝见贤人，谓之不明”和“见贤人而不知其有德也，谓之不智”，可以得出“见贤人并知其有德为智”。提及圣人、贤人，显然与人道相关。

接着，第 17 章“圣人知天道也”，那么圣人就是知仁、人道和天道的了。再者根据第 15 章“闻君子道而不知其君子道也，谓之不圣”和第 17 章“闻君子道，聪也。闻而知之，圣也。圣人知天道也”，那么就《五行》篇内的文字而言，君子道似乎也就可以看作是天道密切相关的相关的存在了，相似程度极高。

《五行》中没有明确说明君子道就是天道，但是就其提到的人道、天道、君子道来看，三者关联极大，虽然其间存在繁杂反复的次第推衍和德目关系辨析，但是三者之间的关系大体可以看作是人道仅次于天道，是天道次第的前一个环节，而君子道与人道密切相关、来源于人道，更加紧密关联着天道，知道了君子道就具备了参悟天道的能力了，运用之就能理解天道。那三者的关系可以看成，人道—君子道—天道，境界不断提升的三个阶段，“君子道”可以看作是人道的精华或者高品质阶段。下面还会继续阐释“闻道”和“君子道”的关系。

第 19、20、21 章，分别阐述仁、义、礼，且与第 12、13、14 章次第描述的内容相对应。22 章也讲了“道”的问题，简-义-道，匿-仁-道，也是讲了仁义与道的关系。第 23 章讲了义、仁，第 24 章讲“尊贤”，“达诸君子道，谓之贤”讲清楚了君子道和“贤”的关系。引申看来，“尊贤”或许可以看作“礼”的内容，如果真是如此，这里果然再次出现了义、仁、礼的次序，如果非然，也不会完全否定这个假设，因为“尊贤”还关涉着另一条线索。即第 19-24 章讲仁义礼。

第 25、26 章，讲述耳目鼻口手足六者与心的关系，即“上帝临汝，毋贰尔心”，反观上文第 8、9、10 章强调的“君子慎独”并且君子之为善、为德有始有终的问题，可以互相照应，即这两部分都在强调坚持君子道要专一并且有始有终。即第 8-10 章、第 25-26 章讲君子道。

第 24、25、26 章讲述进贤、举贤的问题。第 25 章将心统领耳目鼻口手足六者，讲和同的美好，所谓“善”。而第 26 章讲专一不二的同时，也讲进贤、举贤，主要运用“目”和“知”达到进贤的目的。即第 24-26 章讲知（智）的运用。

所以可以认为《五行》强调“知（智）”存在两个目的，一是为了举荐贤人，二是在文章中说明知和仁义礼知（智）圣的关系。

3. “圣人”与“圣”的问题

对比孔孟儒家十分强调的成圣问题，《五行》文中也反复提及士人、贤人、君子、圣人的位阶，然而《五行》是把“贤（人）”“圣”作为德目和能力来强调，而没有刻意地突出“圣（人）”的身份。不论从篇幅上还是从文义上看，“圣人”相比于“贤（人）”“圣”概念，都不是《五行》要突出的重点。不论是“圣（人）”还是“贤（人）”都脱离不了人道的范畴。

第 27 章讲天、人问题，其实间接与前文如第 2 章的天道、人道问题关联。即第 27 章讲天道、人道。

第 28 章为总结段，“闻道”根据前文句式、词汇的组合分析，所指应是“闻君子道”，对此后文还会论证。

即是说，《五行》篇如果从“闻君子道”的角度考察，敷述的内容是“什么是君子道”和“怎么闻君子道”的问题。闻与不闻君子道有一些分辨标志，比如是否与仁义礼知圣紧密相关。仁生出义礼，并且是“人道”的代表（第 18 章“仁，义礼所由生也，四行之所和也。和则同，同则善”和第 2 章“四行和谓之善。善，人道也”），君子道自然归属于人道，那么君子道就应符合仁义礼的标准；圣、知（智）是并列关系，圣知是闻不闻君子道、能不能见贤人的要件（如第 15、16、17、18 章所述）。

4. “乐则有德”

此外，“乐道”而“好德”也是《五行》的文章线索之一。文章第 2、3、11、17、28 章，反复申述“不安则不乐，不乐则无德”或“和则乐，乐则有德”（第 17 章的“乐”出现在“礼乐”的语境下，所以应释为“愉悦”）。

怎么才能“乐而有德”，在第 2、3 章“不安不乐”之前都出现了“知”，知是“安”的前提，第 2 章“君子无中心之忧则无中心之智，无中心之智则无中心（之悦，无中心之悦则不）安，不安则不乐，不乐则无德”，第 3 章“智弗思不得。思不精不察，思不长【不得，思不轻】不形。不形不安，不安不乐，不乐无德”，第 11 章“不智不仁，不仁不安，不安不乐，不乐无德”，结合第 11 章可看出，智是仁的前提，仁是安的前提，“仁”是由“智”达到“乐”的中间环节。第 17 章，“知而安之，仁也。安而敬之，礼也。圣，知礼乐之所由生也，五（行之所和）也。和则乐，乐则有德，有德则邦家兴”，此处“乐”的前提是“和”。

仁与“和”的关系，前文论述过，此处再举一些例证。如第 18 章讲“仁，义礼所由生也，四行之所和也。和则同，同则善”，第 17 章讲“圣，知礼乐之所由生也，五（行之所和）也。

和则乐，乐则有德，有德则邦家兴”，那么“圣”就是“知”与“仁”之“和”，就是“德”，也就是第2章讲的“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德，天道也”，那么“知”“仁”“乐”的关系就是“知”和“仁”之“和”能产生“乐”，即第11章“不智不仁，不仁不安，不安不乐，不乐无德”的反向说明，“圣”就是“知”和“仁”之“和”就是“德”（“德”是五行之和），第28章最后“闻道而乐者，好德者也”，那么“闻道”就是“圣”知才能达到的，而第17章说“闻君子道，聪也。闻而知之，圣也。圣人知天道也”，那么“闻道”就是“闻君子道”，全文的主旨在于《五行》最后一句话，“闻道而乐者，好德者也”即“闻君子道而乐者，好德者也”。

“五行”和才能闻道。那么“乐而闻道”的逻辑就贯通了，即（五行）和-闻道-乐-有德。

另外，在梳理了全文的主要线索后，仍能发现此外的文本内容也较为丰满。其实也不难理解这些部分写作的用意。最后一段前部分讲的仁义礼三个层次，分别在前文第1章、第12-15章、第19-21章部分三次申说，中间的段落则分别用于解决德、圣、知、仁、义、礼几个概念关系的说明，即仁义礼是一个层次，圣、知（智）是高一级、更接近载道之贤人、君子道的层次，进而指出仁义礼是通往闻君子道和进贤必经的阶段与必备的素质；与此同时，知（智）用于进贤、圣可以知天道，拥有知（智）、圣就具备举荐“闻道而乐、而有德”贤人的能力，了解并达到“闻道而乐、而有德”的“君子道”阶段，而这正是《五行》的写作目的，是其主旨。换言之，《五行》是一篇解释怎么达至“闻道而乐、而有德”的“君子道”的文章。

5. 《五行》主旨的要点小结

闻道即闻君子道，圣、知是闻不闻君子道、能不能见贤人的要件；文章主旨是“什么是君子道”和“怎么闻君子道”的问题，闻与不闻

君子道有一些特征：“乐道”而“好德”也是贯穿文章的一条线索——（五行）和-闻道-乐-有德。

V. 结语

综合庞朴、浅野裕一、刘信芳等人的研究，可以看出简帛《五行》篇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还有很多，是一篇极具思想性的文本。

由于《五行》自身叙述的特色，即便解决了文字训诂的问题，确定了《五行》文字的基本内容，它的行文逻辑依然呈现出反复论述的情况，将《五行》的“经”与“说”结合起来对比阅读时更为明显。

虽然学界目前大体上认为《五行》与儒家思孟学派存在思想联系，其文本与《大学》《中庸》有相似性，比如前面提到的浅野裕一等人发现的《五行》提出了提升修养、进阶德行的路线，追求“闻道”“好德”的目标等，但是对于其结构和主旨的解读依然不能完全统一，当然这也是文本自身思想张力的体现。

一方面有不少学者认为《五行》属于思孟学派的作品，根据《荀子·非十二子》和《孟子·尽心下》，以及受最初的简帛整理者、庞朴等人的影响，围绕“五行”即仁、义、礼、智、圣的德目及关系等角度进行解读，认为其是通过解说仁义等德行内外问题组织文章逻辑的。但是纵观全文，文章只在开头段落提到了“五行”的“形于内”问题，之后再也没有提及内外问题，被称为“五行”的仁义礼智圣，只在两处全部出现，即李零本分章的第1章和第17章。另外，文中两处提到“四行”，但是只有第18章“四行”的成员智、仁、义、礼才依次出现了。对于这篇经文有千余字的文章来说，与出现四次、五次的概念“闻道”“闻君子道”相比，如果将仅仅出现一、两次的概念作为文章论说的中心，还是差强人意的。

所以，经过上文的重新梳理和辨析，《五行》篇的经文的的文章结构基本还是清晰明了的，

它叙说了如何晋升至“君子道”、达到“闻道”境界的问题,推阐了其中需要经过历练的阶段、步骤和每个阶段目标达成后呈现出的样态,最终攀升至“闻道而乐”“好德”的境界的情况。最后一章显现出全篇的主旨和谋篇布局的思路,“君子道”“闻道”“闻君子道”在文中反复、多次出现,是文章申说的重点。

《五行》的全文写作的目的和主旨并不在于说明“五行”仁义礼智(知)圣的“形于”内、外问题,而在于讲述如何修行君子道、达到“闻道好德”的最终目的与境界,其间提到的仁义礼知(智)圣、聪、明、善等等,都不是用来描述“进德修业”的过程和状态的,并不是文章阐述的中心。

注释*

- 1 王艳芬,2019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入学、现在在学中,2021年4月爱知大学大学院中国研究科博士后期课程入学、现在在学中,研究方向为周易与黄老道家。
- 2 庞朴认为,帛书《五行》分“经”“说”二部。下文将详细介绍。
- 3 参看裘锡圭:《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四》,中华书局,2014年,第57页。
- 4 帛书本的文章开头,没有“五行”二字,且顺序为仁、智、义、礼、圣。
- 5 庞朴:《马王堆帛书解开了思孟五行说之谜——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之一的初步研究》,《文物》,1977年第10期,第63-69页。
- 6 参看裘锡圭:《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四》,中华书局,2014年,第57页。
- 7 池田知久对于,庞朴的《五行》研究的代表性作品和影响甚巨的《马王堆帛书解开了思孟五行说之谜》进行了详细的探讨,指出庞朴论文

关于《五行》的成书年代和作者所属学派问题立论根据的最基本事实,就是《荀子·非十二子》中所见的对于子思、孟轲的非难,诚然《五行》的确对《荀子》思想有所继承,但是《荀子·非十二子》中非难子思、孟轲的“五行”说,并非帛书本《五行》篇中的“五行”。参看池田知久著,王启发译:《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研究》,北京:线装书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6-37页。庞朴:《马王堆帛书解开了思孟五行说之谜——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之一的初步研究》,《文物》,1977年第10期,第63-69页。

- 8 基于“思孟五行说”,末永高康认为《五行》是先秦儒家性善论发展中重要的一环。末永高康,佐藤将之:《性善论的诞生》《科学·经济·社会》,2022年第6期,第99-112页。
- 9 关于“思孟五行说”的学界讨论情况,参见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研究》的“第二章《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的成书年代及其作者”,“第一节《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研究史的回顾和问题所在”部分。池田知久著,王启发译:《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研究》,北京:线装书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4-28页。以及,可以参考黄俊杰《马王堆帛书〈五行篇〉“形于内”的意涵——孟子后学身心观中的一个关键问题》(黄俊杰《孟学思想史论》所收,东大图书公司,1991年10月)。
- 10 魏启鹏:《马王堆汉墓帛书〈德行〉校释》,巴蜀书社,1991年和魏启鹏:《思孟五行说的再思考》,载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第82-87页。
- 11 庞朴《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
- 12 浅野裕一:《黄老道的形成与发展》,韩文译,南京:凤凰出版社,2021年。
- 13 庞朴《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第155页。

- ¹⁴ 庞朴：《〈五行篇〉评述》，载于《文史哲》1988年，第1期，第3-15页。
- ¹⁵ 参见浅野裕一：《黄老道的形成与发展》，韩文译，南京：凤凰出版社，2021年，第548-550页。
- ¹⁶ 浅野裕一原文有著名名词所在的篇目，由于本文引用了多种研究学者的材料，互相之间的分章并不统一，所以此处不再标注篇目，读者可以依据注释自行查阅。
- ¹⁷ 浅野裕一：《黄老道的形成与发展》，韩文译，南京：凤凰出版社，2021年，第551页。
- ¹⁸ 刘信芳：《简帛五行解诂》，台北：艺文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174-176页。
- ¹⁹ 刘信芳认为，《五行》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孔子与子游。其成文上限可以推至战国早期，其作者未明。子思对《五行》之成书作有一定程度的编撰与加工，简本《五行》二十三章至二十六章属于说解性的文字，此类说解性的文字有可能出自子思之手。刘信芳：《简帛五行解诂》，台北：艺文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185页。
- ²⁰ 涂宗流、刘祖信：《郭店楚简先秦儒家佚书校释》，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第375-376页。
- ²¹ 涂宗流、刘祖信：《郭店楚简先秦儒家佚书校释》，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第375页。
- ²² 涂宗流、刘祖信：《郭店楚简先秦儒家佚书校释》，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第375页。
- ²³ 涂宗流、刘祖信：《郭店楚简先秦儒家佚书校释》，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第375-376页。
- ²⁴ 葛荣晋：《儒简的“性情论”“五行论”——郭店竹简哲学思想初探(二)》，载于《石油政工研究》，2002年，第5期，第22页。
- ²⁵ 任蜜林，认为《五行》的君子思想是相当有体系的，它把成为“君子”作为人类人格修养的最高境界。它认为，君子就是能够把“五行”形于内而时时践行的人，而仁、义、礼、智、圣的“五行”的和谐状态则称为“德”，其是“天道”的表现。因为在《五行》看来，这五种德性都是源自天道的，它们体现了天道。因此，其落实到人身上，也称为人类人格修养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五行》称为“君子”。既然“五行”的和谐体现了天道，那么能够实现五行和谐的君子也就与天道是一致的。如何实现这种最高境界呢？在《五行》看来，要靠“慎独”。而“慎独”就是“能为一”，也就是能够把仁、义、礼、智、圣五种“德行”和谐为一。参看任蜜林：《论竹简〈五行〉的君子思想》，载于《中国儒学》，2016年，第1期，第436-447页。
- ²⁶ 相关地，可以了解下荀东锋的观点。他指出，《五行》的理论结构是，将问题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形于内”的“德之行”层面，讲述仁、义、礼、智、圣五者都发端于内心，且都具有扩充至外的潜力和可能性；另外一个“不形于内”的“行”的层面，这个层面关注的是一个人在社会中怎样成就仁、义、礼、智，但是这种心理扩充实际上是以外部的行为为标准的，没有外部的行为，内心的扩展也无从谈起。《五行》将“行”称为“不形于内”，“不形于内”实际上指德的产生还需要外部的教化和行为。子思的《五行》一方面重视对人的内在性的挖掘，另一方面又重视教化、学习和践行。这确实也是一个有益的思路，展现了《五行》文本思想的一个诠释角度和可能性面向。参看荀东锋：《〈五行〉体现的三个问题意识》，载于《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20页。
- ²⁷ 如徐少华认为，根据《五行》篇的内容和结构，可将全文分为三个部分、二十六个章节，第一部分提出“五行”的命题；第二部分围绕着善、德、智、圣及相互关系立论并展开，进而引申

出“慎独”和“金声而玉振”之说；第三部分围绕德、仁、义、礼及相互关系立论、解说、引申，重点在以德、圣为代表的“五行之所和”上。虽然他在摘要部分就讲明了《五行》的结构大意，却缺乏一个“一以贯之”的观点来标明本文的主旨，所以阐发还是不够彻底的。参见徐少华：《楚简与帛书〈五行〉篇章结构及其相关问题》，载于《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3期，第12-19页。再如甘伟和冯雪华认为，简帛《五行》篇的结构可分为外在篇章结构和内在意许结构。外在篇章结构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帛书有《经》有《说》，而竹简只有《经》。《五行》篇的结构重点在内容分类上，分为德行论、圣智观和成德进路三个部分。“德行论”是整个《五行》篇认识论的发端，对“形于内”与“形于外”之“形”进行了哲学意义的界定。“圣智观”对关于圣智与“思”、圣智与“聪明”等问题进行了宗教意义的阐释。“成德进路”或言“四知成圣”，旨在从逻辑的角度论证先秦儒家的成圣路径。虽说将《五行》内容分为三个严整部分，但是这三者之间还是没有清晰阐明其一贯的线索或主旨，也就是说这三个部分之间的关系仍然需要加以说明才好。依此看，《五行》的三个部分，关系不是那么紧密，或者说作者还未阐明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所在，弊端和徐少华的一样。参见甘伟、冯雪华：《简帛〈五行〉篇的结构及哲学意义》，载于《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5卷增刊，第35-38页。

²⁸ 赵辉：《经与先秦说、解、传的发生及演化》，载于《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73页。

²⁹ 赵辉：《经与先秦说、解、传的发生及演化》，载于《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73页。

³⁰ 来国龙：《论战国秦汉写本文化中文本的流动与固定》，载于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办《简

帛》(第二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23页。

³¹ 池田知久就持有此种观点。池田知久 著，王启发 译：《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研究》，北京：线装书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8-41页。

³² 刘晓军对此也有简单说明，“经”是学说或观点的纲要，“说”是对“经”的解释或说明，“经”“说”组合成文体，较早见于《墨子》，而《韩非子·储说》是经说体的典范。周秦时期，经说体是诸子陈政的重要文体，广泛见于儒、道、墨、法等学派。参看刘晓军：《“说”祭与“说”体》，载于《学术月刊》，2019年，第5期，第121-123页。

³³ 庞朴：《马王堆帛书解开了思孟五行说之谜》，《文物》，1977年第10期，第65页。

³⁴ 池田知久 著，王启发 译：《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研究》，北京：线装书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9页。

³⁵ 末永高康主张，帛书《五行》是由“经”以及逐字逐句解释“经”的“说”构成，而楚简《五行》只包含相当于帛书本“经”的内容。楚简《五行》出现以后主流意见发生转变，认为“经”的成立先于孟子，并认为“经”与“说”的作者并非同一人，只有池田知久仍旧坚持“经”“说”为同一人所作。而且《五行》“经”的部分应是子思之作。参见，末永高康，佐藤将之 监译：《郭店楚简〈五行〉的修养论》，《科学·经济·社会》，2021年第1期，第106-117页。

³⁶ 高新华认为，先秦诸子的“经解体”和“经说体”之间含义有所不同。仅据《管子》《韩非子》来看，“经解”体的特点有：（一）逐字逐句地详细解说经义；（二）不重字义训诂；（三）颇多引申发挥，实属一家之言，如《形势》《明法》；（四）在形式上往往在一段解经文字之末以“故曰”引出所解经文；（五）

“解”文很像老师授课的记录或讲义，故与“经”的作者和时代可能不统一。依据《墨子·经说》《韩非子·内外储说》，大概可以分析出“经说”体的特征为：（一）非详解经文，而是重点说明；

（二）“经”皆简短，大都仅仅表露观点，如果没有“说”，读者很难理解“经”的确切含义，所以“经”“说”是相辅相成的；（三）在形式上“经”文中多有“说在”之语，提醒读者“说”文的内容或关键；（四）由二、三两条推断，“经”“说”的作者和时代多数应该是统一的……。先秦诸子的“经说”，“经”与“说”相辅而行，是阐发自己观点的特殊著述方式。相反，诸子中的“经解”乃学派内部师徒传习中所形成的文体，与儒家经学中的传、说、故、微等在性质上更相近些。参见高新华：《先秦解经文体论略——兼论简帛〈五行〉篇的文体定名》，载于《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49-50页。

³⁷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0-108页。选取李零本，是因为该版本对于原文的整理比较清晰，文字隶定清楚确定，易于阅读，另外，出版后久经研究检验，学界对此版本的认可度也相对较高，可信度高。

³⁸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 [5] 池田知久 著，王启发 译：《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研究》，北京：线装书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原书出版于日本，池田知久：《馬王堆漢墓帛書五行篇研究》，汲古書院，1993年）
- [6]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 [7] 陈来：《竹简〈五行〉篇讲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
- [8] 浅野裕一：《黄老道的形成与发展》，韩文译，南京：凤凰出版社，2021年。

*参考文献

- [1] 庞朴《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
- [2] 刘信芳：《简帛五行解诂》，台北：艺文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 [3] 魏启鹏：《简帛〈五行〉笺释》，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
- [4] 涂宗流、刘祖信：《郭店楚简先秦儒家佚书校释》，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